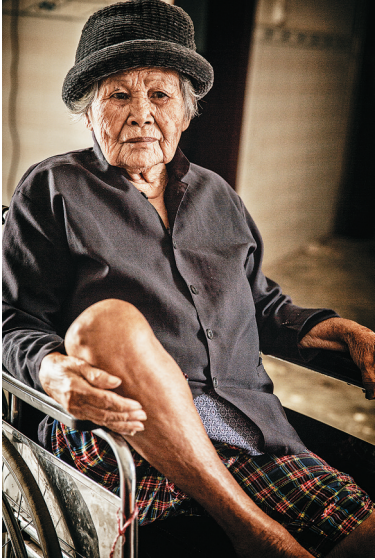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符美菊，1929年生，澄迈中兴镇土龙村人，现已双腿瘫痪，靠家人推着轮椅移动，但老人有着积极乐观的心态。

王志凤，1928年生，澄迈县中兴镇土龙村人。耳聋。



林爱兰，1926年生，现住临高南宝镇敬老院。她向我们展示抗战胜利60周年的纪念章。

她们

◀上接 B02 版

人言可畏

每个老人心里都有这么一把刀，“我们是来探望老人的，再追着问，我们就结束吧”，惠明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钟惠明，制止了同行的一家媒体的记者向老人们追问过去，“你们不要让她听见了，这是她们的伤心事”，“我们有志愿者了解情况，你们问陈厚志吧”。

钟惠明是特地从香港飞来，探望这些老奶奶的。他称这些老人为“老奶奶”，他告诉记者，“没有什么理由，碰见了，有能力就管了”。事实上，钟惠明和他的团队坚持做这件事，已经有十多年了，每年至少来海南探望她们一次，除了海南，他们还去山西。他们关心老人的身体状况，每年会带

基金会的志愿者易都是位摄影家，以拍摄人物出名，“如果填充起来，年轻时，一定是个美人”，回程时，易都忍不住感慨。“就是因为长得漂亮，她们才会被日本人抓去，有些是被汉奸出卖献给日本人邀功”，志愿者陈厚志补充道。

这些当年如花似玉的“慰安妇”，现在已是身患残疾、满脸风霜的老阿婆了，平均年龄在90岁左右，长期生活在偏僻山区，常年被头痛、腰痛、腹痛、肢体残疾等病魔缠绕，生活艰难。虽然悲剧已经过去70多年，但在她们身上留下了很多创伤，好几位老人都瘫痪在床，生活无法自理，病痛时时折磨着她们。

其中一位老人60多岁的儿子告诉记者，他记得小时候，他妈妈的口头禅是，“你再不听话，就让日本鬼子把你抓了”。

的老人，勇敢之举的背后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。更多的老人则是默默忍受着不可说的伤痛，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曾经是“慰安妇”，害怕伤害到现在的家庭。

陈亚扁老人是勇敢的，作为海南最早起诉日本政府的“慰安妇”之一，她曾三次赴日本出庭，控诉当年日军的罪行。

这位勇敢的老人，今年90岁，家在陵水县祖关村委会祖孝村，现居当地养老院。被抓的时候，还不满15岁，在日军不同地方的慰安所中遭受非人的折磨长达四年之久。在这四年里，每天晚上，她都要遭受日本官兵的轮奸，有时两三个，多时有四五个不等，稍有不从就会遭到毒打，不管她怎样痛苦地哀求和拼命挣扎，他们都不理睬，直到昏死过去才罢休。

除正规慰安所外，日军当年还在据点、炮楼里和流动军营里建立临时慰安所，里面的“慰安妇”几乎都是海南本地妇女。她们不仅是日军的性奴隶，还是日军的劳工，被迫做苦力。

日军占领保亭南林峒后，开始修建三亚到南林桐的公路，据了解，已经去世的老人谭玉莲，就是第一批被征集的劳工。当劳工的第二天，她就被日军强奸，随后她与另外三名女性成为日军的慰安妇，白天晒盐、煮酒，还要为日军洗衣服、打扫卫生。晚上则随叫随到，稍有不从便会遭到毒打，被日军奴役直到抗战结束……

解放后，村里人都知道她们做过“慰安妇”，没有人愿意娶她们，甚至，还有人在她们背后指指点点，背地里称她们“日本娘”。

1957年12月，32岁的陈亚扁嫁给了同村的一位鳏夫，然而婚后不到一年，丈夫便去世了。三年后，陈亚扁再次嫁人，因曾饱受日军摧残，患了严重的妇科病，她先后9次怀孕，其中8次或流产或死产，到40岁时才生了一个女儿。

现在，老人们大多浑身是病，头、颈、腰、腿等多个部位伤患疼痛，几乎每个人都有风湿病，有些已不能行走。对她们而言，日本鬼子是魔鬼般的存在，日军的暴行仍历历在目，她们中的大部分人至今生活在70多年前耻辱的阴影中，心灵备受煎熬。

无言抗争

96岁的郑亚洪，现已瘫痪，不能行走，每天靠孙子把她抱到屋檐下休息。她是陈亚扁的同村，现居陵水县祖关村委会祖孝村。她是陈厚志整理陈亚扁的口述时发现，原来郑亚洪也曾是“慰安妇”。



李美金，1920年生，澄迈中兴镇土龙村人。热情乐观的老人，在家门口一直以笑容迎接我们。

着老人做全面检查，出钱给她们看病，支持她们对日诉讼。

这一次，他们给每个老人发了3000元的红包，并送给每个老人一条丝巾。钟惠明亲自给每个老人系上丝巾，丝巾的颜色绚丽，这个时候，老人们满是皱纹的脸会笑成一朵花。“她们跟我母亲的年龄差不多”，钟惠明告诉记者，“慰安妇”的慈善项目每年要花费20万，即便如此，还是留不住这些老人，她们每年都在消失。

海南的受害老人中，有很多黎族、苗族的女性，她们本是家里的宝贝女儿，如果没有遭受这些，她们应该会有一个幸福、美满的家庭，会有一个疼爱她们的丈夫，会子孙满堂。可惜她们生在了乱世，又偏偏天生丽质，出众的外貌带给她们无尽的痛苦。

“她们的脸型、轮廓都很美。”惠明慈善

有些老人有丈夫，有儿子，有孙子，甚至有重孙，面对过往，不愿意开口，家里人也不太愿意提起这段往事，亦不愿意公开自己的信息，只想让自己的母亲安安静静地安享晚年。

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，因为人言可畏，有的受害者在自己的村庄无法嫁人，她们的父母只能把她们嫁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。“村里人骂我是‘日本老婆’、‘日本妓’”，陈亚扁老人告诉记者，无奈之下，她只好躲进了吊罗山里，过着野人般的生活，直到解放后，她才被政府找回到村里，分得土地。

控诉罪行

每一个敢于站出来揭露当年日军暴行